

■ 岭南建筑丛书 第二辑

商都往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SHANGDU WANGSHI
GUANGZHOU CHENGSHI LISHI YANJIU SHOUJI

潘 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岭南建筑丛书 第二辑

商都往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潘 安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都往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潘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10

(岭南建筑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112-12713-9

I. ①商… II. ①潘… III. ①城市史-广州市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3026号

责任编辑: 唐 旭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马 赛 赵 颖

岭南建筑丛书 第二辑

商都往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潘 安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4³/₄ 字数: 368千字

2010年12月第一版 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ISBN 978-7-112-12713-9

(196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总 序

“岭南建筑丛书”第一辑已于 2005 年出版，至今已有五年了。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广东和其他地区一样，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建设文化强省”的号召、鼓舞下，岭南建筑创作正逐步走上新台阶。

五年来，岭南建筑创作的发展，有喜有忧，喜的是在建筑创作上百花齐放，作品众多，如广州亚运会的场馆、亚运村环境景观等，岭南地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忧的是真正能够反映岭南特征和风貌的建筑创作及环境还是不够突出。

什么是岭南建筑的特征与风貌？很难全面下一个定义，或者给出一个标准。概括来说，创作作品中，建筑功能结构要求做到务实、经济，适应本地气候地理，节能节地节材，室内与室外结合，环境典雅、舒适宜人，以人为本并富有朝气，如果能达到这些要求或者部分满足，就可以有岭南建筑的韵味了。

优秀的建筑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该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反映。建筑创作表现有国家、民族的特色，这是国家、民族尊严和独立的象征和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成熟和富强的标帜。

现代世界建筑发展，崇尚现代化、高科技。但是，在建筑创作方面，要不要有国家、民族特色还是国际化，长期来存在较大争论，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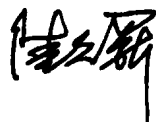
国家由民族和地区组成，民族和地区建筑的特征明显，国家建筑的特征也就明显。岭南在我国南方地区，气候地理特殊，建筑风貌表现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很有特色。总结、传承和发扬岭南地区传统和近现代建筑创作特色和经验，有助于今天的新建筑创作，也更有利于创造我国现代化的新建筑特色。

岭南建筑创作人员的工作风格是宁愿实践操作、苦干实干，而不喜撰文总结、写作，这也是创作中提高不明显的原因之一。要想在创作上进一步获得提高，理论总结和探讨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我们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意图，就是希望在岭南建筑创作上进行总结探索，

包含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各种工艺手法、新技术、新材料等，从实践总结提高到理论，有系统、有条理、有理念的进行介绍交流，共同提高。

岭南建筑创作当前最需要的是总结提高，加强理论。我们欢迎广大岭南建筑创作实践的教学，科研和设计人员踊跃参加这个编写队伍，为弘扬传承岭南建筑文化、加速岭南建筑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 序

绪 论 1

商业起源 1

因汉朝的存在，我们的民族就被称为“汉族”；因唐朝的存在，遍布世界的华人聚居区就被称为“唐人街”；因商朝的存在，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盈利的事业就被称为“商业”。商业中的“商”字，来自于商族的商。商族人善于经商，武王伐纣后，周朝取代了商朝，商朝贵族后裔被集中在城市管制，周朝人称其为商人。这些商朝贵族后裔别无他长，只能靠做买卖维持生计，故周朝习惯称做买卖的为商人。再后来，人们渐渐忘却了这段历史，只有商人和商业的词汇和概念流传下来。

感性抑商 3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仇商仇富的倾向。商人是“末技游食之民”、商业是“奸伪之业”的观点，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中华民族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且这一观念影响至今。但是，在政府的实际管理中，唐朝及其以后国家层面的抑商政策已为罕见。汉朝时期，中国的重心不在南方，在北方，岭南的重心不在东部，在西部。唐朝以后，这些状态发生了转变。广州大规模发展港口经济和商业经济是在唐朝前后，因此，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没有受到抑商政策的太多影响。

理性释商 5

无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农抑商多么强势，中国古代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将商业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理智和严谨的。“食货”是中国理论界很早就建立的与商业有直接关系的概念。食货概念建构于商朝，完善于汉朝，影响至今。

第一篇 广州城市起源

第一章 始皇北御南拓 11

秦始皇不需要动用五十万军队去对付老百姓，屠睢南下是为了军垦，不是为了战争。从屠睢部队的布局来看，秦军的主要目的地是岭南西部的交趾地区和闽浙的东瓯地区，而广州一直是秦军的根据地。这说明，广州地区在屠睢南下前，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的基础，其兼容与蓄的传统由来已久。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彰显了广州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与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

第二章 任嚣初定郡址 24

任嚣选择广州建城，是因为那里适于建城，还是由于那里太不适于做国都、太不适于做郡城了？任嚣意欲独立，他的城市选址就需要偏离中原，又要有相对稳定的政治与军事局势。可以肯定地说，任嚣的郡址选择基本上没有考虑选址是否适于城市建设，更不用说考虑是否适于城市发展了。

第三章 赵佗立国治都33

广州因任嚣选址建城而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赵佗接任后，立国扩城，再一次提升了广州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赵佗城虽然规模不大，仅为秦咸阳城的1%，但其控制的岭南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福建大部分土地，是秦国土面积的1/10以上，具有了南方中心城市的功能。

第四章 岭南重心东移44

秦人南下的最初400年里，岭南政治中心有300年的时间一直在中部的梧州，后步骥恢复了广州的省会城市身份，政治中心东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其经济重心仍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在中部。广州的地名源于梧州，与番禺毫无瓜葛。虽然广州不是一个适于建设城市的地方，但它潜在的港口条件让它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个临港大城市，步骥的远见在于当一切还没有发生时，他已作了政治安排。

第五章 商业城市初成52

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与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让广州成为了南越国的首都，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天然的海港优势和地理条件，让广州具备世界港城的潜在竞争力。但是，秦汉时期，岭南与中原的主要交通要道在西部，海上对外主要基地也在西部。因此，这个时期的城市发展是有限的。

第二篇 城市文化特征

第六章 南海神庙之谜63

南海神庙是隋文帝下诏建的，像这样的案例在岭南并不多。通常，皇帝下诏建庙宇的，多为有重大事件发生，或关系到国家战略。江苏有北帝，浙江有观音，福建有妈祖，广东有祝融，南方各省都有自己的海上神祇，这些神祇中只有广东的祝融最为特殊。因为祝融是不是南海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南海神问题再次彰显了广州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与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

第七章 禅宗发祥地考76

达摩来到中国拓展业务，可惜，达摩没有把广州作为此行的目的地，而是假道广州进入中原。达摩在中原建树不多，故有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和只履西归之说。达摩之后五代传人亦是如此。后六祖惠能移师岭南，禅宗不经意间风靡起来。禅宗因岭南而愈传愈盛，岭南因禅宗而愈显魅力。

第三篇 商都形成过程

第八章 贸易网络建构93

唐朝，海上交通网日臻完善，其中最长的一条航线可达14000公里。特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唐王朝首先在广州派驻市舶使，这是中国市舶规范管理的突破，也是官方首肯广州为外贸港口城市的标志。市舶制度历经了唐朝专人管理、宋元专门机构管理到明朝制度终结的三个阶段、四个朝代。

第九章 商都基本格局 101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广州城市发生了变化，城市与中原的交通关系彻底改善，城市功能和格局基本成型。唐朝广州的港口结构稳定，内外双港的空间格局形成。海外商人侨居广州人数达12万人之多，占广州本地城市人口1/3强，出现了具有明显国际城市特色的蕃坊区。唐朝广州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将城区内的茅草房基本都改造为砖瓦房。在南汉时期，广州的地貌也有了重大的变动，番山和禺山被铲平，城市直接面向珠江。

第十章 六脉三城建设 111

宋代是广州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自然景观保留比较完整的时期。宋朝广州重修了子城，又称中城，增筑东、西两城，史称“宋三城”。同时，宋朝也有一个没有记录在案的南城，它说明了唐宋时期，广州已经开始主动向珠江要城市建设用地了。宋朝广州修建和完善了地下排水系统——六脉渠。宋朝时期，广州的一溪、两湖、三石、四港风光依旧。

第四篇 港城艰难岁月

第十一章 市舶对弈海禁 121

海禁与迁海给中国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广州也不例外。但其外港和南方大港的地理条件，又使广州在这长达几百年的浩劫中得以苟延残喘。明朝从海禁到开关，历经了四个阶段：朱元璋寸板不得下海；朱棣的贡舶模式；正德向私货征税；隆庆开关。期间虽有反复，但趋向一致。广州市舶司在朱棣登基后恢复，摇摇晃晃坚持到明末。

第十二章 贡舶贸易重构 130

明朝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海禁抑制了国内外贸产品原产地的生产，贡舶贸易破坏了唐宋时期建立的海上贸易体系，一口通商刺激了广州周边地区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广佛为核心的产、供、销的外贸经济链。明朝的广州城市平面前方后圆，很像悬挂在越秀山脉上的一口大钟。这种平面形式，我们在客家民居中可以见到，在南京的中山陵中，吕彦直曾以这种平面作为警世之寓。

第十三章 清朝迁海劫难 140

元朝、明朝和清朝都曾经海禁过，而且，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严厉。他们都是在皇朝初期海禁，到了后期开禁。清朝政府将海禁衍化为迁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清朝的开禁与元明两朝的不同点在于，清朝海禁是被洋鬼子用枪炮打开的。

第十四章 十三行冲击波 149

在海禁和迁海的残酷环境中，广州十三行成了一支蜡烛，它虽然不是很亮，而且还经不起风雨，但它毕竟是火种，毕竟带来光亮。十三行为中国外贸事业留下一扇窗口，也为中国外贸事业的未来探索着路子，还为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保留了一丝希望。后来，广州十三行模式在上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再后来，人们只记得十里洋场，却忘记了广州。十三行变成了历史，变成了孤案。

第十五章 烈火中的蜕变 159

19世纪初，英国商人在对华贸易中大幅度亏本，很多不法英商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最高峰时期，英商一年内向中国输入鸦片400万斤，相当于每一百个中国人一年要吸食英国鸦片一斤，鸦片倾销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禁烟、销烟和鸦片战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心由南海向东海转移。

第五篇 近代城市建设

第十六章 中山战略概要 175

过去,由于通商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较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使得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对西方的天然抵触。商人本来就低人一等,商人学习的东西自然属应被嗤之以鼻之类,更何况是向来被轻视的“夷人”的东西。现在不同了,国家落后、国家惨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研究激情、学习激情。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将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和孙中山四人列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其中,三位是广东人。

第十七章 立市拆城筑路 186

明朝之前,广州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在岭南地区呈一枝独秀态势,没有与周边城镇发生必然联系。明朝之后,受海禁政策的影响,岭南地方产业蓬勃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主体,以广州、佛山双元组合为中心的城镇体系框架。鸦片战争以后,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一样,其城镇体系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外贸易中心发生了转移。岭南的海上外贸中心转移到了香港,华东外贸中心,或者说中国海上外贸中心转移到了上海。

第十八章 济棠治市八年 196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广州曾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短暂的中央政府所在地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曾率先探索工业发展,近代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曾对周边地区起了辐射与带动作用,建构了岭南城镇体系和经济体系。客观地讲,广州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几个大城市之一。

第十九章 走向现代城市 207

现代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主要有四种方式:空运、水运、铁路运输和高速公路运输。其中,水运是由古代技术发展演变的,空运、铁路运输、高速公路运输则是现代技术的产物。

结束语 215

礼制与规模 215

中国历史上,礼制对城市与建筑的发展影响较大,其主要表现为对城市或建筑的规模的限制。礼制制度在城市规模上的影响是城市历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规模终结 217

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建造规模宏大的城市和建筑已经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需求问题。帝王将相对于城市或建筑规模的追求反而更加理性了。因此,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不是建造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而是在封建社会的中期。

特例广州 221

我们不能用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广州城市的发展历史。两千年来,广州一直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它的规模扩展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广州城市没有实施过里坊制,它从来就是开放的。广州城市规模在明朝之前是与地区经济和环境相脱节的。广州固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是其发展的真正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27

绪论

商业起源

因汉朝的存在，我们的民族就被称为“汉族”；因唐朝的存在，遍布世界的华人聚居区就被称为“唐人街”；因商朝的存在，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盈利的事业就被称为“商业”。商业中的“商”字，来自于商族的商。商族人善于经商，武王伐纣后，周朝取代了商朝，商朝贵族后裔被集中在城市管制，周朝人称其为商人。这些商朝贵族后裔别无他长，只能靠做买卖维持生计，故周朝习惯称做买卖的为商人。再后来，人们渐渐忘却了这段历史，只有商人和商业的词汇和概念流传下来。

什么是商业？

商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或者说是进行交换活动的盈利性事业。

为什么叫商业呢？

商业这个词汇源于商人这个词的出现。商人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中国的奴隶社会。最初，商人是指商朝时期统治中国的商族人。商族人善于交易，而且善于运用交易达到目的。在那个以农耕为主的年代，商族人善于以货物交易而获得利益的个性显得十分突出。商人的“商”，就是因为古代商族人善于交易而得名，后来，人们就把商人从事的事业称为商业。

有关交易的传闻故事一直伴随着商族人的成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4000多年前，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地为商^①；他的部落便被称为商族。^{①今陕西商县}商族部落的第七代首领是王亥。王首领英明能干，并懂得做生意。他发明了牛车，驯牛驾辕，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一天，王亥在贩运货物的途中，突然遭到了狄族易氏的袭击。易氏抢走了货物和随行的奴隶，并杀死了王亥。王亥有个儿子叫甲微，他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后，兴兵讨伐易氏。灭掉易氏后，商族的势力也扩展到了易水流域。这是商族人早期经商的记载，也是商族人早期扩张势力范围的记载。

商汤灭夏桀也与商族人善于交易有关系。商族发展到商汤时期已经很强大了，于是就有了消灭夏王朝，取而代之的意向。当时，商族的手工业水平较高，尤其是纺织业已相当发达。于是，商汤组织了商族妇女大量织布纺纱，换取夏的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是国家基本储备，粮食的储备状况是衡量国家是否强大和国家军事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商汤通过以布换粮的方式，掏空了夏桀的国家粮食储

备，大大降低了夏朝的军事能力，为消灭夏桀做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商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了商王朝。这是商族人运用商业贸易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的成功案例。

自商汤之后的600年里，商族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武王伐纣，商族人的统治才算结束，周王朝取而代之。周朝初期并不稳定，周武王仙逝、周成王年幼时，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与纣王的儿子武庚曾联兵反叛，因周公东征平叛，才有了周王朝的800年的统治历史。周公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为“成周”。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说的是周公建立洛阳后，就把商朝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集中到洛阳管制，以防再次发生叛乱。

周朝人称这些被强迫迁到洛阳的商朝遗民为商人^①。周朝政府把他们当做刑满释放犯严加监管，经常组织他们学习、训斥，要求他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认真真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商人由贵族变成了奴隶，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陷入了从来没有过的困境。但是，它们总是要生存下去。商人怎么过日子呢？

为了生存，他们重操旧业，做他们比较擅长的事情，就是跑买卖。买卖这一行，周朝的贵族是不会做的，周朝的庶民要种地，也不能做，而买卖又是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所以，商人跑买卖应该说是为周朝统治者所默认的。久而久之，买卖成为了商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也使商朝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在城市居民中成为一组比较有个性和特征的群体。

于是，周王朝社会形成了一个概念，即：跑买卖的人都是商人。慢慢地，商人由特指商朝遗老遗少，演变成特指从事一个行业的群体了，跑买卖这个行业也被称为商业。后来，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但是，做买卖的人被称为“商人”、做买卖的行业被称为“商业”的概念已经被社会认同，并一直流传至今。

尽管，商人是因为商族人善于做买卖而得其名，但是，商朝贵族后裔毕竟是亡国之人，因此，中国商人公认的“祖师”不是商族人，而是来自于战国时代的白圭^②。白圭是靠经营农产品发家致富的，因司马迁《史记》的介绍，而成为商人的鼻祖。

白圭比王亥晚出生一千五百年，白圭成为商祖，自然盖住了商族人对商业启蒙的贡献。现代商人只知道白圭，而不知道王亥，不知道商人与商族人的瓜葛，不知道商业名称起源，就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的鼻祖。

司马迁概括了白圭的经商之道，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乐观时变”原则^③，而且要“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也强调经商中“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的作用^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商人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员，成为后来封建社会仕、农、工、商的四民之一。

①商朝曾以殷为都城，商朝灭亡后，其遗老遗少被称为商人或殷人、顽民。

②白圭：名丹，战国时人（公元前370年—前300年），曾魏国为官，后在秦为官。《汉书》中说他是“天下言治生者祖”，即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

③经商家注重抓住时机，贱买贵卖。货物供过于求时，敢于买进；货物供不应求，能够抛出。关键是掌握信息，反应快速，出手果断。

④商人要博学多闻和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做买卖，要像伊尹、吕尚一样深谋远虑，如同孙子、吴起用兵一样运筹帷幄，近于商鞅执法一样雷厉风行。

感性抑商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仇商仇富的倾向。商人是“末技游食之民”、商业是“奸伪之业”的观点，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中华民族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且这一观念影响至今。但是，在政府的实际管理中，唐朝及其以后国家层面的抑商政策已为罕见。汉朝时期，中国的重心不在南方，在北方，岭南的重心不在东部，在西部。唐朝以后，这些状态发生了转变。广州大规模发展港口经济和商业经济是在唐朝前后，因此，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没有受到抑商政策的太多影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重义轻利”倾向，而且认为“义”与“利”两者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非此即彼的。趋利是商业的基本特性，由此，误导一个观念：无商不奸，商者必背信弃义。

春秋战国时期常有经商致富者利用自己的钱财为国家效力的传说和故事。有这么一个案例：春秋时期，郑桓公立国于新郑，这是当年各国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①。一日，秦军欲偷袭郑国，郑国富商弦高得知后，用12头牛犒劳夜奔的秦军，秦军思量再三，终于撤军。弦高上演的富商救国一幕，毕竟是众多孤案中的一个，并不能改变社会的一种共识。

抑商高峰期多数都是发生在商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争夺劳动力时期，这个时期，帝王将相、社会贤达、诸子百家都会加入声讨工商的行列，其声势非常可怕。

孟子说过，商人是“贱丈夫”^②；韩非曾把商人归为社会一害，即“五蠹”^③之一^④；李悝的国策是抑制手工业^⑤；商鞅对经商致贫者的态度是：让他们做奴隶^⑥。

封建社会早期，粮食储存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统治者们的确在真心实意地、踏踏实实地干着“重农抑商”的勾当。

当然这些帝王将相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还可以表白自己的圣贤，可以表白自己的纯洁高尚，可以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保持一致。所以，早期社会中，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肆意打压工商。

一般来讲，让人们望“商”生畏有四种手段：官营禁榷^⑦、重征商税、改变币制、户籍管理。说直白一点就是：限定商人的经营范围，政府控制盐铁等暴利行业；再有就是通过税收制度，加重商人负担^⑧；还有就是通过币值变化，增加经商成本；最后是通过限制人口流动，设置经商障碍。

汉朝是早期封建社会“劝课农桑”、“重农抑商”的代表。

汉朝是一个真正的穷困国家。刘邦勉强取得天下后，又迫害功臣，自剪羽翼，虽统一海内，但内力大损。都说汉朝穷，汉朝穷到什么地步呢？

汉朝的三公九卿上朝时，没有宝马香车，只能弄些耕牛来充数。汉朝级别低些的官员们，甚至连牛车也配不起，上班靠走路。汉朝的大臣如此，汉朝百姓的窘迫境况就更为严重了。汉朝初期，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朝廷上

①郑国曾利用地理优势发展商业，富国强民。也因地理区位，周边列强对其虎视眈眈。

②孟子在与梁惠王探讨治国纲要时提出的观点。

③蠹，dù

④韩非是第一个把农称为“本”，把工商称为“末”的学子。

⑤李悝辅佐魏国时强调发展农业，提出要“尽地力之教”和“禁技巧”的观点。

⑥商鞅认为应该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经商者要采用严厉政策。

⑦官营：国家垄断盐等重要商品经营权；禁榷：禁止民营。汉武帝官营盐铁；明清官营盐、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

⑧西汉时期，商人的算赋要加倍

下穷成这个样子，你说他们能先去搞流通，而不优先发展生产吗？

汉高祖、汉惠帝和吕后都采取轻田租和抑兼并的政策，制定了《田律》、《田令》、《水令》，促进农业发展，并以农田水利管理的好坏，作为官吏考绩的重要内容。汉朝早期皇帝的重农政策，使汉朝经济条件逐渐有所好转。

汉武帝是重拳打压商业的风云人物。汉武帝时期，恢复了对商人征收6%财产税的政策，还规定了在征税过程中“贾人倍算”的政策。也就是说，商人要交的税是农民的两倍，如果商人出售自己做的产品，则要交四倍^①，而且商人及其家属不能占有农田。

汉武帝对商人漏逃税行为的惩罚制度非常严厉，经常对商贾进行大抄家，“得民财以亿万计”。汉武帝的“征重税”和“奖励揭发偷漏税”政策，使很多商贾破产，对兴农抑商起到了一定作用。

之后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是国家从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被称为“文景之治”。两帝的精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农业的发展方面，譬如坚持“清静无为”和“躬修节俭”原则，解决了吃闲饭的人多^②和淫侈之风严重的问题。汉文帝规定：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将田租税的税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后全部免去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推行举孝悌力田，实行根据入粟数量的多少决定爵位高低的政策，即入粟拜爵^③。

“文景之治”使农业进入良性循环状态，粮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商业禁锢才有所放开，譬如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④，促进农业生产，取消出入关的“传^⑤”等，说明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统治者还是要发展商业的。

中国式抑商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就是对商人的人身羞辱。这种抑商方式让很多爱面子的中国人对商业望而却步。

对商人的人身羞辱，包括限定商人的政治权利，商人后代不能当官、不能当吏，商人不能穿华丽的服装，商人不能坐豪华的车舟，商人不能住奢华的屋宇等^⑥。

以衣着限制为例。

衣着限制可以表现社会对某类人群的厌恶或敬仰，也可以表现某类人群的社会等级。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服装，特别是服装颜色常常具有特殊的含义。有些朝代的官服是用紫、红、蓝、黑等不同颜色来区别不同级别的官员。

封建社会时期，有两种颜色的服装是大家不能碰的。一种是黄色的服装，它是帝王的专用色，你穿了黄色的衣裳，就等于要谋反篡逆，是要杀头的。另一种是绿色的服装，那是下等人的专用色，宋、元后，绿色成为了娼界的标志颜色，普通百姓不敢穿绿^⑦。妓女的父兄也要裹绿头巾，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戴绿帽子。当然，妓女也有其他“标签”，比如“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⑧”。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商人服装的规定。譬如：汉朝政府规定，商人不能穿丝衣。晋朝政府规定，商人必须戴帽子，帽子上要缝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姓名、卖什么东西。晋朝政府还规定，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

①商人“率缗(mín)钱二千而算一”，手工业者制造手工业品并出售而有收入者“率缗钱四千而算一”

②汉初有“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之说。

③晁错曾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即所谓入粟拜爵。

④文帝曾同意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鼓励民间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⑤汉代的关隘都设卡，控制人口流动。出入关时，要持有一种叫做“传”的符信（凭证）。后文帝废止了这个制度。

⑥汉武帝时代，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而且还要承担重租税。

⑦百姓不穿绿颜色衣服的状况，到清朝才有所改变。

⑧明朝时期有此规定。

当然，人身羞辱并不能构成对一个行业的实质性打击，真正能够左右商业发展的是历朝历代的商业政策。对商人的人身羞辱是表面的，它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对商业行业管理的苛求是本质上的，它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做法。

总的来说，到了唐宋时期，虽然对商人人身迫害的个案仍时有发生，但全社会苛求的商业管理制度已经较为罕见了。

理性释商

无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农抑商多么强势，中国古代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将商业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理智和严谨的。“食货”是中国理论界很早就建立的与商业有直接关系的概念。食货概念建构于商朝，完善于汉朝，影响至今。

唐宋之后，非理性的抑商政策已属罕见，朝廷政权基本上都能理智地发展商贸事业。商业发展环境的改善，除了与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外，还与自古以来诸学子在感性抑商的环境中，能够理性地研究商业并建立起食货理论框架体系有关。

“食货”的核心是农、工、商的均衡发展问题，与农、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处理国与民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关系的经济活动及其政策、制度、措施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调节各部门的生产结构的作用，古人统称为“食货”。

最早提出“食货”的是历史伟人箕子^①。

箕子被称为中华第一哲人，箕子语录被认为是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箕子、比干、微子被孔子誉为殷末“三仁”^②。

箕子与纣同姓，属殷商贵族，才华横溢，任太师。箕子佐政时，见纣王用象牙筷子进餐，感而叹之：纣王用象牙筷子，就会用玉杯；用玉杯，就会思远方珍宝；思远方珍宝就会奢靡不振也。老人家观察敏锐，推理严谨，而且不幸言中^③。后来，纣王生活果真越来越奢靡，无心顾及朝政。

箕子屡谏纣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却说：作为朝中重臣，因为君王不听自己的谏言而拂袖离去，就相当于通过把君王的恶行大白于天下，表白自己，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呀^④。箕子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其学问、其人品，长时期影响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主流。

既不忍心抛弃纣王，又不能说服纣王放弃奢靡生活，箕子只能装疯了。

后来，纣王囚禁了箕子。

再后来，周王解救了箕子。

再后来，周王向箕子咨询了治国秘方。

再后来，箕子不愿意做周朝的顺民，跑到了朝鲜，建立了东方君子国，其流

①箕子，名胥余，生于商周之交。因封国于山西太谷县东北的地方，当年称箕，爵为子，故称箕子。

②比干是纣王的叔父，箕子与纣王同姓，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比干先辅帝乙治殷，又为纣朝少师，称亚相，子姓，后周武王赐其林姓，成为林氏的太师祖。微子在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帝乙立纣为王，封微子为卿士。

③箕子后来路过朝歌时，只见遍地野生麦黍，宫室残骸立于其中，感叹到：纣王呀，纣王，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

④箕子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

①周武王灭殷后，将平壤封于箕子，于是就有箕子朝鲜侯国的成立。箕子朝鲜侯国被誉为“君子之国”。一千年后，西汉燕国人卫满灭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

风遗韵，至今犹存。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①。

在箕子去朝鲜之前，周王曾经向箕子讨教过治理国家的道理。“食货”二字就是在箕子向周王讲述治国秘方的一段对话中出现的，这段对话由后人整理为《周书·洪范》。所谓“洪”，大也；所谓“范”，法也。这里的“洪范”，即为“大法”。北宋王安石说：《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武王与箕子都是一代治国大家，应该说，《洪范》概括了周之前的所有治国经典。

《周书·洪范》写的是什么呢？

据载，箕子说治国的常理定于大禹，是上帝赐予的。这些常理概括起来，有九种大法。箕子借助上帝的威望，娓娓动听地陈述了九种大法的具体内容：全面掌握水、火、木、金和土五行；认真做好貌、言、视、听和思五事；努力履行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种政务；合理运用岁、月、日、星辰和历数五种计时方法；君王建立政事要掌握五福法则；正确使用正直、刚克和柔克三种品德的人；选择掌管卜筮的官员，用卜决疑；经常注意使用雨、晴、暖、寒和风五种天气的征兆；凭五福鼓励臣民，凭六极警戒臣民（表 0-1）。

治国九种大法			表 0-1
	九件大事	内容	解释
1	全面掌握五行	水、火、木、金、土	水向下润湿，产生咸味；火向上燃烧，产生苦味；木可以弯曲、伸直，产生酸味；金属可以顺从人意改变形状，产生辣味；土壤可以种植百谷，产生甜味
2	认真做好五事	貌、言、视、听、思	容貌要恭敬，就能严肃；言论要正当，就能治理；观察要明白，就能昭晰；听闻要广远，就能善谋；思考要通达，就能圣明
3	努力施行八种政务	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管理好粮食生产、财货流通、祭祀、居民、教育、盗贼、朝觐和军事
4	合用五种计时方法	岁、月、日、星辰的出现情况和历数	历数是指日月运行所经历的周天度数
5	建立法则	掌握五福	通过赏赐，要求臣民尊重法则
6	正确用人	抑制刚克，推崇柔克	正直：中正和平；刚克：强不可亲；柔克：和顺可亲
7	用卜决疑	选择建立、掌管卜筮的官员	教导他们卜筮的方法
8	注意五种天气的征兆	雨、晴、暖、寒、风	
9	善用五福和六极	五福是五种幸福 六极是六种不幸的事	五福：长寿、富、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 六极：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不壮毅

箕子的治国大法概念中，涉及国家政务的只有一个，即第三大法，被称为《洪范八政》^②。

②因为当时是以农立国，这八项原则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又称“农用八政”。

箕子归纳的国家八大类别行政业务，排在前两位的是“食”与“货”。这里的“食”，是指对生产食物的耕、渔、樵、牧的管理，并引申到与其相关的很多领域。

这里的“货”，是指对可以通有无之物的管理，并引申到税收等很多相关领域。

食货理论与实践丰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是春秋战国时代呢？

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聪明，而是因为春秋战国是一个竹简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竹简为理论精细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群雄为实践多样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竹简使文字普及，人们要说的话，不再需要通过口口相传，只需要克隆竹简，流通竹简，任何思想、理论、观点、制度、政策都可以昭告于天下。

在竹简普遍使用之前，虽有鼎文，但毕竟难以普及，大部分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要事件和重要决定都要依靠口传。口传思想、口传理论、口传历史、口传经验、口传制度、口传指令……口传影响着社会，口传占据着社会，口传主导着社会……

口传的最大问题是容易失真。口口相传，难免会有夸张和添油加醋的现象，难免不被口传者善意或恶意篡改，难免不被以讹传讹，一个历史事件传到最后，可能就是因为过于脱离现实生活而演变成传说或神话。

口传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够精细和没有证据，还要受口传者活动范围的限制。

竹简改变了这一切。

竹简创造了一个有证据的社会，创造了一个不可以随便篡改别人的思想，也不可以自由地否定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言论的年代，创造了一个多元的文化和社会。竹简可以让作者的思想流传百世而不失真，可以让作者的本意昭告四海而不走样。

竹简让这个时代成为：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的时代；现实生活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指南初步统一的时代；人们追求理论的严谨性和逻辑性的时代。人们开始要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也需要认真研究与他人观点的差异。

百家争鸣因竹简而成为可能。

历史积淀的经典思想、理论、观点因竹简的出现而出现。《周易》、《周礼》、《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都是对历史的总结。

在这种大背景下，食货理论和实践因精细而丰富。食货理论出现了以“足君先足民”和“轻赋薄敛”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相地衰征”和“官山海^①”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无为而治”和“损有余补不足^②”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兼爱非攻”和“节用”的墨子理论，“开源节流”和“裕民减赋”的荀子理论等。

孔子推崇“均”、“固穷”，墨子主张“固本以用财”，孟子强调“物之不齐”，庄子宣扬“同乎无欲”，荀子提倡“节用裕民”。

群雄争霸，为诸多食货学说和食货理论提供了不同的实践机会。经济利益最大化是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保证，诸侯引经据典，相继进行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有追求思想道德、社会伦理的，也有改良食货实践的。

“食货”框架稳定于汉代，归功于班固^③。班固择《洪范八政》中的“食”与“货”两政，合为“食货”的概念，并在《汉书·食货志》中给予系统的阐述。

班固的《食货志》分上下两卷，它源于《洪范八政》，又借鉴了司马迁的《平准书》。但《食货志》按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谈食货，内容更加丰富。班固说，食

①最早提出“官山海”理论的是齐国宰相管仲，他说“唯官山海为可耳”。西汉的理财家桑弘羊，也曾推行了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所谓“食湖池，管山海”。

②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

③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在世60年（公元32—92年）。班固一生的代表作是《汉书》。

货是治国之首^①、安民之本，“财”是食足货通的结果。班固列举了诸多上古时期帝王将相运用“食货”政策治理天下的案例。

①班固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

譬如：班固提到，神农氏教民种田和市场交易，百姓“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尧、舜都是将率领百姓摆脱饥饿作为首要政务的，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懋迁有无，才使天下得以治理，百姓安居乐业。商、周两代之所以兴盛，也是因其以安民作为国政之首。

班彪是班固的父亲，也是班固的引路人。班固在撰写《汉书》时，秉承并发挥了其父的作风和观点，既叙述了实践活动，也记载了国家的政策、措施，实行的各项制度，还介绍了对某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例如，班固介绍了贾谊的“论积贮”及“反对官铸铜钱”的观点、晁错的“论贵粟疏”中的观点。

《食货志》的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包括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劝课农桑之法、田租、徭役、卖官鬻爵、屯田、官俸、赏赐、皇室费用、预算制度等。《食货志》的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包括军饷、商税、财产税、治理水患、盐铁专卖、铸钱、赈济、借贷、五均、六筭等。在经济措施方面，涉及了均输、平准、会计、漕运、常平等。

由《食货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式抑商绝不仅仅是因为重义轻利，更不是因为商业是“奸伪之业”，而是求食足货通的手段。中国两千多年的抑商声势是给别人看的，抑商背后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环境下，是变化的。

广州商业城市的特征形成于隋唐时代，这个时期，抑商已成孤案。粮食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经济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商业逐渐成为了国家重要的支柱，打压商业等于遏制自己的经济发展，封建帝国的统治者们就不那么热衷于抑商了，甚至于鼓励商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但是，抑商伦理道德的历史积淀，又不能让封建政界的君子们放开手脚发展商业，不能在形式上与商人穿一条裤子。于是，商业制度上就出现了表里两层皮，表面上依然抑商，但很多制度的设定都是顺应商业发展需求的。譬如，唐朝的商业政策比较清晰，也就是说商税稳定，币值稳定，人口流动自由，只是禁止民营经商范围并没有减少。譬如，元、明、清三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朱元璋和福临，都禁止过海上对外贸易，朱元璋还立下祖训，要求世世代代禁止海上对外贸易。但实际上，他们的子孙们都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海上经贸。

清朝时期，政府每年收入的4000万两银子中，关税就占了400万两，统治者还可能真正地抑商吗？

顺应商业发展成了唐朝以后大多数统治者的必修课。重农抑商逐渐流于形式。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性质的确定和城市规模的扩展形成于隋唐，与国家经济走势和商业政策变化是趋于一致的。

因此，在广州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明显的抑商政策和抑商案例。